

抗战时期“工合”运动的历史作用

朱敏彦

“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简称“工合”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开展的一场经济救亡运动。它是在国际友好人士倡导下,在各种抗日进步力量的共同努力下产生的。它对于组织人民大众、开展生产自救、克服经济困难、支援长期抗战,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抗战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当时曾有“经济国防线”之誉。

中国工合运动的最初发起人是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和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及其夫人尼姆·韦尔斯(原名海伦·福斯特)。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艾黎和斯诺夫妇等人经过反复酝酿后,在一次上海各界爱国人士出席的“星一聚餐会”上,提出了“一个在中国建立工业合作社的概略计划”,当即得到全体成员一致赞同,并于1938年4月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工业合作社设计委员会,大家共同推艾黎负责召集。设计委员会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讨论,于同年5月,写出了一份成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和发展工业合作社的计划。这一计划得到了宋子文、孔祥熙等国民党政府官员的赞许,更得到了周恩来、博古和宋庆龄等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大力支持。经过各界抗日进步力量的共同努力,1938年8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武汉宣告成立。孙祥熙出任理事长,艾黎被聘为技术顾问。8月24日,经过卢广绵等人的努力,宝鸡的十几个打铁工人组织起来,成立了中国工合的第一个合作社——宝鸡打铁社。此后的3个月内,就有80余个小工厂在西北地区建立。工合率先在宝鸡和西北地区的迅速发展,表明组织工业合作社的计划是适应抗战形势需要,各地也都纷纷办起了工业合作社。1939年初,工合总会先后设立了西北办事处(陕西宝鸡),西南办事处(湖南邵阳)、东南办事处(江西赣县)和川康办事处(四川重庆)等四个区办事处。

工合运动不仅在国统区迅速铺开,同时,在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也蓬勃开展。1939年初,西北工合延安事务所正式成立,这是工合在解放区设立的第一个事务所,短短几个月中,延安地区就建立了15个合作社。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和工合运动的深入进行,特别是为了适应解放区和游击区工合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在1940年到1941年,工合总会下设各区的办事处进行了调整。西北地区的工作范围限在陕、甘两省,另设晋豫区办事处(河南洛阳);东南区限在赣、闽、粤三省,另设浙皖办事处(浙江兰溪);西南区则为湘桂区办事处(广西桂林)和滇黔区办事处(云南昆明),川康区仍维护原状。经过调整后的工合大区一级的办事处从4个发展到7个。这样,一条漫长的工合线,便一路从东南敌后游击区伸入西南、西北大后方,从蒙古高原直至云南山地,工业合作社星罗棋布地出现在四川、西康、云南、贵州、陕西、甘肃、宁夏、山西、绥远、河南、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西、福建、浙江、安徽等18个省的大半个中国广阔大地上。据不完全统计,到1942年6月,七个区共计1595个合作社,22680名社员。整个工合每月生产总值达24022944元(法币),社员股金5645558元,总会和银行贷款15727857元。^①

中国工合运动的蓬勃发展,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而也赢得了国际援华机构和友好人士的深切同情和鼎力相助。为了争取更多的国际援助,推动工合运动的进一步发展,经宋庆龄倡议,于1939年1月,在香港成立了工合国际委员会。尔后,宋庆龄又派人到世界各地建立工合推进委员会。从而,工合运动得到更多的国际援助,推动工合运动更广泛地开展。

工合运动的开展,对于战时经济建设,支持长期抗战起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国人民全民族抗战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功绩。

首先,工合运动有力地补充了战时经济的不足,及时生产了大批军需民用物资,支援了长期抗战,成为战时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

抗战前夕,中国新式工业十分有限,而且发展极不平衡,大部分工业都集中在生产条件较为优越的东南地区及沿海沿江一带。其中仅上海一地便聚集了全国民族资本工业厂家的50%,全部资本额的40%和全年产额的46%^②。与此相反,内地的工业却相当薄弱,西康、青海、宁夏三省还没有近代工厂,四川、湖南、广西、陕西、甘肃、云南、贵州七省的近代工业也仅占全国工厂的6.02%,资本额的4.21%和产业人数的0.79%^③。抗战爆发后,日寇在对工业集中的东南沿海地区狂轰滥炸之后,又迅速占领了这些地区,并对占领区的工业疯狂地进行掠夺和破坏,同时,又对西南、西北内地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这样,使抗战大后方的经济几乎崩溃,抗战军需物资匮乏,人民生活用品奇缺,整个战时经济极其困难。正是在这种新式工业一时无法大量兴建,而原有的旧式手工业又难以满足战时军需民用物资激增的严重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以手工业为主的因地制宜、就近取材、投资少、见效快的工业合作社的出现,立刻成为战时经济的重要力量。

各地兴建的工业合作社,用简陋的设备,克服种种困难,生产出大量的军需和民用物资。仅据西北工合主要部门1940年的月生产能力统计,纺织社可织棉布110万尺,毛呢39630尺,棉毯7410条,军毯或毛毯35700条,棉巾7000打,丝绸19980尺;机器社可制造织布机144台,织袜机有背心机35台,弹毛机11部,蒸汽机2部,木炭动力机9部;制革社每月可产底皮2270张,面皮3480张,绵羊皮4350张;服装缝纫社每月可制军服15120套,长短筒袜12240打^④。整个抗战期间,工合历年制造的纺织、榨油、印刷等机器及农具共12万余具,帆布、军布及各种民用布匹8万平方码,军用毛毯150万条,各种军服、军鞋及日用服装100余万件^⑤。工合生产的这些物资一方面源源不断运往抗战前线,直接支援着抗战事业,同时,又不断销往后方市场,满足内地人们的日常生活需要。正如宋庆龄向世界各地的援华机构和国际友人介绍工合的重要作用时所指出,“工业合作社能够维护经济稳定,能够维持内地市场,避免乡村的紊乱与匪患,即令日本完全占领了我们一切的大都市。工业合作社能够利用一切的失业工人,使我们的士兵获得衣食,并且免除饥荒,以及别种经济不稳定。”总之,“工业合作社能够支持长期抗战,使日本对于占得城市丝毫无利可图。”^⑥它已经成为战时中国经济的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其次,工合运动有助于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发展,增强了前线作战部队对敌斗争的物质力量。

国民党政府对工合的支持,主要局限在国统区,其拨给工合的经费,也几乎全部是资助国统区的工业合作社,据1940年初的调查,解放区的工合数量占全国工合的六分之一,所得贷款仅占百分之一^⑦。相持阶段到来以后,国民党政府由片面抗战转为消极抗战,对工合运动也由支持到应付,甚至对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的工合活动加以歧视和压制。但是,在致力于工合运动的爱国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的共同努力下,在共产党的大力支持下,解放区的工合运动终于

冲破国民党政府的阻挠,生机勃勃地开展起来。解放区工业合作社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国外捐款和边区政府及银行的贷款。工合国际委员会通过西北办事处把大部分捐款汇发解放区。仅1940年初这一次,斯诺就将在马尼拉募得的10万元捐款,提供给陕甘宁边区,用来发展边区的毛织工业合作事业^⑧。此外,工合国际委员会的秘书陈翰笙,还经由上海银行,通过廖承志和唐明照,把部分捐款转到延安。连绵不断的捐款通过各种途径送往解放区,促进了解放区的工合事业的发展,工业合作社的生产能力也由此不断增长。至1942年9月底,延安地区已发展有41个工业合作社,共1041名社员,入股资金已从1941年的669314元法币增加到3434040元,工合每月的产量为:270条毛毯,600条棉毯,14493包色布,2466包粗布,1325双毛袜毛鞋,1500顶毛帽,325只羊毛袋,30000条肥皂,16796包牙粉,3250斤面粉,1400磅豆粉,6000磅植物油,3888磅盐,257箱纯碱,605磅酒精,2043磅粉笔,5250瓶墨水,55000张纸^⑨。工合的这些产品极大地补充了解放区公营经济的不足,对于解放区克服经济困难,争取经济形势好转,起了很大的作用。此外,解放区的工合还拥有一些铁矿、煤矿、制造厂、铁工厂、制药厂、运输站和油井等行业。据1945年6月的不完全统计,在黄河以北的华北各解放区先后建立了包括40余种不同类型的工业合作社230多个。这又有力地推动了解放区的经济建设的发展。

工合国际委员会也经常委托西北工合承制大批的棉军衣、棉坎肩、背包、军鞋等。1939年,宋庆龄曾一次委托西北工合承制10万件棉衣,当时宝鸡、西安等地的纺织、服装工合组织不分昼夜地赶制出来,打包托运给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⑩。工合根据需要,必要时还迁进一些生产军需物资的合作社到解放区。一次艾黎为开展工合工作到延安,从毛泽东那儿了解到晋西北的贺龙部队缺乏制造手榴弹的铁料时,就想方设法,从晋东南迁一个炼铁合作社到晋西北,帮助贺龙部队制造手榴弹等军用物资。对于工合给予解放区的大力相助,毛泽东曾作出高度评价,认为“在华北游击区和西北接近战区的地区组织建立这种工业合作社……对于我们的斗争贡献之大,将是不可估量的。”他深信,只要坚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坚持中国与国际朋友共同合作。“毫无疑问,我们是能够打败日本,取得胜利的。”^⑪

工合对战斗在华中敌后的新四军也给予很大的帮助,工合浙皖办事处在兰溪,距皖南的新四军驻地较近,这为把工合办到新四军驻地创造了有利条件,为了支援新四军抗战,工合浙皖办事处主动同新四军联系,要求新四军派人参加工合工作,为此,新四军政治部先后派了叶建明、侯蔚文和蒋传源等前往工合工作。为了把工合直接办到新四军驻地,1939年10月,工合在新四军根据地的中心泾县茂林镇办起了泾太(泾县和太平县)事务所,尔后的7、8个月中就在茂林地区先后办起了造纸、制碱、制鞋、缝纫、烧炭、竹器等十几个合作社,在这些合作社中还有残疾军人组织的雨具合作社。合作社生产的产品,主要是供应新四军军需之用。如造纸合作社生产的纸张供新四军印刷《抗敌报》和印文件之用,从而打破了敌人对新四军重重的经济封锁^⑫。为了支援新四军抗日和向前线的临时工厂输送技术力量,艾黎还先后两次亲自到皖南新四军驻地,指导皖南工合运动的进一步开展。工合在皖南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受到广大新四军指战员的大力赞赏。叶挺曾专门寄信感谢工合在皖南组织合作社、高度评价了工合对新四军的有力支援,赞誉“皖南工业合作社给予我们重要的援助。这些工业使我们区里的难民得以生产自救。它们帮助我们利用本地的原料,使不致落于敌人之手。因此,我们能够抵挡敌人货物之侵入,并有可能自给自足,使皖南人民得到了好处。”^⑬为此,叶挺认为工合在皖南开展的一切活动,有力地支持了新四军长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增强了部队对敌斗争的物质力量。

其三,工合运动赢得了世界上爱好和平民主的国家和人民的支持和援助,提高和扩大了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的地位和影响。

工合运动的最初发起人物就是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和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及其夫人尼姆·韦尔斯。在兴办过程中,更得到许多国际友好人士的鼎力相助。英国大使卡尔、大使馆秘书亚历山大和美国大使馆参赞文森等人都给予热诚的支持。特别是英国大使卡尔,亲自赶到武汉,把兴办工合的计划面呈蒋介石、宋美龄和孔祥熙,并向他们专门作了介绍,力促国民党政府支持工合运动的开展^④。工合运动蓬勃兴起之后,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而进一步赢得国际援华机构和友好人士对中国抗战深切同情和密切关注。1939年底,当宋庆龄在香港发起组织工合国际促进委员会时,许多国际友人都予以极大的支持,香港的英国主教何明华亲自担任该会的主席,由于他一向同情中国抗日,不断宣传中国抗战和工合对抗战的贡献,故享有“红色主教”之誉。燕京大学经济系英国教授、合作专家戴乐仁对工合也给予积极支持,帮助制定工合社的组织章程和会计财务管理制度等,工合国际委员会成立后,又担任过委员会委员、副主席。另外,斯诺、艾黎、埃文斯·卡尔森、普律德女士等外国友人都担任过委员。

此后,工合国际委员会便着手在国外建立工合促进委员会,使国外援华机构和友人支援中国抗战的活动能更有效地开展。斯诺夫妇亲赴马尼拉组建工合菲律宾促进委员会,由美国驻菲律宾总督夫人塞尔担任名誉主席,博雷博士为主席,但诺尔先生为总干事。普律德女士赴纽约,建立了工合美国促进委员会,由美国总统罗斯福夫人亲任名誉主席,太平洋舰队司令雅纳尔将军任主席,普律德女士担任秘书,美陆军部长史汀生等百余人为委员。美国促进会在海外各国中是最大的,费城、波士顿、华盛顿、纽约等主要城市都设有分会。罗斯福总统本人对工合也十分关心,1942年2月24日,罗斯福总统在白宫接见斯诺,以极大的兴趣听取斯诺对中国工合运动的开展、作用和意义的介绍后,当即表示在给蒋介石去信时,要向蒋表明他个人对中国工业合作社的强烈兴趣,并要求得到一份工合发展情况的报告。两年后,在1943年的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还专门向蒋介石夫妇问起工合的发展情况^⑤。英国工会促进委员会取名为“英中合作发展公司”,表示英国在战时战后都希望同中国工合保持长期的经济技术合作和联系。该公司推工党领袖克里普斯夫人为名誉主席,工党政府交通运输大臣、国会议员巴恩斯任主席。

工合国际委员会和国外推进委员会在世界各地广泛宣传中国战区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意义以及工合对支持长期抗战的重要作用。这样,一方面扩大了中国人民神圣抗战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加强了中国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联系,从而推动了同情中国抗战的外国友人和海外华侨募集捐款活动的开展。整个抗战期间,英国工合推进委员会对工合的捐款约在10万英镑以上,美国约300美元,连同港澳、菲律宾、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地在内,海外的捐款总额共计为500万美元^⑥。从而,在资金、材料、设备等方面有力地支援了中国工合运动。

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援往往是相互的,中国工合运动的开展也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道义和行动上的支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西南地区的工业合作社曾为滇缅路的盟军制造帐篷、降落伞、行军床等军需品,修理卡车、吉普车等军用车辆,修筑道路、机场和建造临时住房等军事设施,有力地支援了盟军的军事活动,直接鼓舞了盟军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进行^⑦。工合的这种朝气蓬勃,同心协力的精神传遍了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埃文斯·卡尔森负责指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飞行突击队就以工合飞行突击队命名,卡尔森竭力向他的战士灌输工合精神,激励他们英勇作战,在南太平洋地区初战日本,就取得了多次胜利^⑧。

其四,工合运动培养和训练了一批经济建设的有用人才,这不仅是当时工合运动中的中坚力量,而且在日后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工合从一开始就十分注重技术人才的教育和培训工作,把教育和生产、人才建设和工合发展联系起来。艾黎曾强调指出:“工合社如没有技术的协助和推进,今后的命运仍难免于自毁一

途的。”“训练一班有技术能力的社员乃职员是今天工合社刻不容缓的事情”^⑨。最先开展起工合运动的西北地区，从组社之初，就注意到合作社年轻徒工的培育训练工作，曾先后在宝鸡、兰州、西安等地组织短期技术训练班多期，训练内容主要是生产技术的操作。工合在全国各地兴起之后，各地区的工合组织也都纷纷办起各种类型的训练班、讲习班，培养和训练熟练工人。工合国际委员会成立后，还在成都办起过一个工合研究所，主要从事工合业务的理论和实际的研究工作、出版有关的书籍刊物，着重训练各地区开展工合的骨干。为了进一步培养愿为工合运动效力的进步青年。该校学制2至3年，学员实行半工半读制度。一方面在课堂上学习业务知识、理论原理。学校设置的课程主要有中文、英语、地理、会计、实用机械、制图、机修、测量、冶金等；另一方面自己动手修建校舍、安装机器、开辟教学和生产基地、建立实习工作科目的车间。主要有精纺、织布、印染、造纸、机器复印、制革、缝纫、玻璃制造及工具制造等。其中有不少科目是由毕业出来的学生主持^⑩。培黎工艺学校前后共培养出中等技术人才六、七百人。这些人才不仅成为当时工合运动的中坚力量，而且也作为战后的经济建设起了骨干作用。直至新中国建立后，在西北和东北地区的许多企业，包括像玉门、大庆这样的国家重点企业，都有工合培黎学校的毕业生从事技术性的工作。

抗战胜利后，以手工业生产为主的带有民族性质的工合运动，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它的力量和规模顿时衰减下来，到解放前夕，唯有工合办的培黎工艺学校还硕果仅存。1952年改名为兰州石油技工学校，由政务院重工业部直接领导。同年，工合总会在《人民日报》发表声明，其全部档案和财产由全国手工业合作社接管。这样，抗战时期轰轰烈烈的工合运动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①陈翰笙：《中国合作社史话》，《陈翰笙文集》第197页。

②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料》第一辑，第78—79页。

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中国近代经济史》（下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65页。

④《西北工合通讯》第八卷，第12期。

⑤季崇盛：《中国合作事业概观》，《经济周报》第三卷，第2期，1946年7月11日。

⑥《新华日报》1938年8月24日。

⑦《新华日报》1940年2月24日。

⑧《新华日报》1940年2月24日。

⑨《保卫中国同盟报告》（英文版），1943年重庆。

⑩卢广绵：《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第119页。

⑪《艾黎自传》，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0页。

⑫蒋传源：《记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39辑，第38页。

⑬路易·艾黎：《保卫中国同盟与“工合”》，《永远和党在一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7页。

⑭埃德加·斯诺：《为亚洲而战》，《斯诺文集》第3集，第68页。

⑮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国杂记》，《斯诺在中国》，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69—170页。

⑯卢广绵：《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第126页。

⑰同上，第124页。

⑱路易·艾黎：《在中国的六个美国人》，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19页，第208页。

⑲路易·艾黎：《“工合”的技术训练问题》，《中国工业》第23期。

⑳陈翰笙：《中国合作社史话》，《陈翰笙文集》第206页。